

民国时期太虚僧团在东南亚的 “佛教外交”活动

沈庭¹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国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民国时期太虚法师及其弟子法舫、白慧、达居等师徒两代人曾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从事佛教外交活动，这些活动大致可分为两大时期：一是抗战时期，主要目的是保障滇缅公路畅通，联络东南亚及南亚各国加入抗战事业；二是抗战胜利之后，主要任务更多地偏向于研究南传佛教、印度梵文佛教及南亚、东南亚的宗教和哲学等，试图以“人间佛教”理念沟通大小二乘佛学、汉传和南传、印度佛学，这构成了太虚“世界佛学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两个任务是贯穿始终的，只是不同时期策略有所偏重。太虚僧团的这些努力对当今展开“一带一路”建设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东南亚 南亚 民国佛教 太虚 佛教外交

【中图分类号】 B51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 (2021) 01-0098-08

太虚法师是近代佛教史上最为重要的改革家之一，同时也是同时代高僧里面最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大师。早在1923年，太虚便在庐山大林寺发起世界佛教联合会；1928年的欧美考察则进一步开拓了他的国际视野，他在伦敦无线电台演讲时，呼吁全球佛学同志“共作佛学的世界运动。佛学的世界运动，拟先从设立一世界佛学院起手，征求世界各国的佛学者，共同来发起建设，集合世界各文各派的佛学及佛学者，作分门的与融贯的研究，再传布为世界人类共同信解之佛学，这便是世界佛学院的主义”。^{[1] (p331-332)}他创设武昌佛学院（尤其是在其中设立世界佛学苑图书馆），以及研究汉藏文佛学的汉藏教理院，研究华日文佛学的闽南佛学院等等，也可视作其“佛学的世界运动”的一部分。他在1940年曾回顾说：“世界佛教运动，即是佛法救世运动。这种运动，是我佛教运动中一贯的宗旨。”^{[2] (p88)}具体就东南亚（包括锡兰和印度）而言，太虚及其弟子曾多次下南洋访问考察、朝圣、讲法，“锡兰系”佛学是他非常重视交流、融通的三系佛学之一。

大体而言，太虚所领导的武昌佛学院一系对东南亚的交流活动可分为两期：一是抗战时期，二是抗战胜利后。就前者而言，学界研究较多，^{[3][4][5][6]}尤其是近来不少学者通过新出的档案等资料发现太虚访问东南亚和南亚的“佛教外交”活动表面看来属于“国民外交”的一部分，实际上却有着国民党政府深厚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意图；^{[7] (p431-461) [8] (p20-60)}相对而言，第二阶段较少被关注。本文希望在学界已有的成果之上，不只考察太虚一人，而是将武昌佛学院一系太虚及其弟子法舫、白慧、达居等师徒两代人在东南亚和南亚的交流活动都纳入研究视野；也不仅仅关注他们在抗战时期的外交活动，而是将其在战后的交流与研究活动也作一通盘考察，以期丰富此议题的研究。

一、抗战时期太虚僧团在东南亚的外交活动

作者简介：沈庭（1984-），男，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国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支那内学院与近代佛教知识的创生和发展研究”（20YJC730006）阶段性成果；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14JZD034）阶段性成果；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1939年至1940年间，太虚组织中国国际佛教访问团曾出访缅甸、印度、锡兰、马来半岛、暹罗等国家和地区。太虚担任佛教访问团的导师，慈航、苇航、惟幻、等慈、俨然（后来代替等慈）等法师为团员，陈定谟、谭云山、王永良等人协助。1939年11月，太虚等访问团的主要成员由昆明出发，经滇缅公路前往缅甸。访问团在缅甸受到热烈欢迎，在缅甸、仰光举行的欢迎会和游行活动参与者多达十万人，太虚赠送的舍利金塔被供奉于仰光大金塔，太虚本人每日午后一点到两点在仰光驻地接见中缅信众。太虚法师会见缅甸僧俗领袖时，明确强调滇缅公路对中国抗战的影响，以及保持该路畅通的重要性，缅甸的那沙美、那边僧王等人亦回应滇缅公路有利两国交往，双方还同意通过互派留学僧，举办佛学讲演、办中缅双语杂志等方式，加强中缅佛教的交流。访问团还慰问在缅华侨，鼓励华侨支持国内抗战，并建议他们在云南兴办摆夷（傣族）教育、兴办佛教教育以巩固中国边境。^[3]

1940年1月，太虚等人由海路抵达印度，开始在印度的访问。他首站来到加尔各答，当时是印度的首都。太虚等人的轮船一靠岸便有数百人在码头迎接，有印度、孟加拉等国的佛教界代表，英国印度各大报的记者，也有各界华侨代表、中国驻印总领事等等，场面十分隆重。太虚在华侨欢迎会上发表致辞，一方面指出访问团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佛教是“抗战建国的精神基础”，十分受政府器重；另一方面，表达“希望能成立佛学分会，以增加诸位的幸福，增进中印的亲睦，增强我中华民族在国际间的力量！”^{[9] (p95)}太虚等人拜访了甘地、尼赫鲁、波史、泰戈尔等印度名流，其中，波史（S. C. Bows）是印度国大党政治领袖，该党一直倾向于支持中国抗战，曾于1938年派遣一支“印度援华医疗队”支持中国抗日战场。太虚法师对国大党的伟大友谊表示感谢，并传达了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决心。^[4]

1940年2月24日，太虚等人到达锡兰，“全锡兰人民都对来自中国的僧人有很好的表示”，访问团抵达科伦坡时，首相亲自到码头迎接。锡兰佛教徒大会、比丘大会、最高巴利文学院举办的欢迎会规模宏大，参加人数达到万人。太虚提议设立“中锡文化协会”与“世界佛教联合会”，加强中锡文化交流，得到锡兰各界支持。太虚委派法舫法师前往锡兰协助马拉拉博士办理成立“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事宜，该会于1950年5月成立，已成为当今影响力最大的世界佛教组织。马拉拉博士《世界佛教徒联盟》一文所记：太虚大师、中国国际佛教访问团是“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发起者和创立者。^[3]

3月27日，太虚为首的访问团抵达新加坡，先后访问了柔佛、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马六甲、西贡等地。发表了“在家学佛次第”“菩萨行与新生活运动”“八正道与改善人群生活”“佛教与中国女学”等演讲，将人间佛教思想和理念介绍给马来亚佛教界，使得人间佛教开始在新、马播下种子。^{[3] [10]}1940年5月4日，访问团在国外访问历时5个多月，取得了丰硕的访问成果。

太虚此次之行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表面看是国民外交性质，但其实有着浓厚的政治意图和政治色彩。1939年9月，太虚在《海潮音》刊文：“佛教访问团通电各通讯社、各报馆、转全国同胞、海外侨胞、暨全世界佛教徒公鉴：太虚等顷因国中文化界之启发，佛学人士之赞助，及海外各地佛徒之吁请，爰组织成立本团，将赴缅甸、锡兰、印度、暹罗等处，朝拜佛教诸圣地，访问各地佛教领袖，借以联络同教之感情，阐扬我佛之法化；并宣示中国民族为独立生存与公平正义之奋斗，佛教徒亦同在团结一致中而努力……兹者、本团取道滇缅公路出发在即，敬布衷诚，伫闻明教！佛教访问团导师兼团长太虚率全体团员叩皓。”^{[11] (p299-300)}此中并未明确提到国民政府对访问团的支持及其真正的政治意图，有意掩饰其政治性质和目的。实际上，据当代学者的研究，访问团从筹备到成行都有着南京（重庆）国民政府的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部及社会部等部门的参与和支持，该访问团的真正目的是打通缅甸境内的大陆交通线，而“国民外交”只是该团的一个政治伪装。^{[6] [7] (p432-437) [12]}

1938年以后，抗战形势日益恶劣，日本开始封锁中国沿海，阻止其他国家援助中国抗战的物资进入中国，于是，滇缅公路成为我国抗战事业的生命线。而日本方面则在东南亚大肆造谣，宣称中国政府是共产的政府，是耶稣教政府，摧残佛教，而日本同中国作战，是佛教同耶稣教的“圣战”；同时利用东南亚各国长期受西方殖民统治之苦，独立意愿强烈的心理，宣扬“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宣称日本与东南亚各民族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推销其“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实际上，东南亚人民对中国及其抗战事业了解甚少，日本的造谣、挑畔欺骗了大批东南亚民众，缅甸、泰国等地都曾出现排华事件，甚至导致“战时大动脉”滇缅公路关闭3个月之久。^[9]所以太虚访问团此次出行，主要工作便是宣扬中国政府弘扬佛教的德行，揭破日寇在缅

甸、暹罗等国蛊惑人心的谣言，揭露其在中国战场的残忍暴行，从而团结东南亚各国支持中国抗战事业。可以说太虚访问印度等国是一种“佛教外交”——即透过（宗教界）僧人的访问活动，以达到拉近中国与其他友邦国家的关系。^{[7] (p434)}

太虚等人访问南洋诸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访问团回国后，太虚领导的武昌佛学院一系持续展开了对东南亚和南亚南传佛教的交流和访问活动，一直持续到太虚法师过世为止，而这些活动学界关注相对较少，故下面将作一些较为详细的阐述。

太虚法师领导的佛教国际访问团在东南亚和南亚的访问非常成功，无论在国民外交层面，还是在佛教文化交流层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此鼓舞，太虚回国后便积极筹备派遣中国僧人前往南洋留学。这次派遣出访人员包括传教师法舫法师，留学僧达居、白慧二师，此次派遣的意义和性质与以往都不同，“平常的单纯是留学而无传教，这次却传教留学，双管齐下。”^{[13] (p212)}尤其是法舫，以传教师身份出访，担负着在东南亚和南亚诸国弘扬汉传大乘佛教的重任，这可谓汉传佛教主动“走出去”的先驱事件。时人对其赋予重望，陶冶公赋诗云：“楞伽心印肇前贤，法本无生总属缘；（引经旨故云）此日南行宏所学，一乘精义遍三千。”^{[14] (p286)}

特意强调法舫的传教师地位，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据美国学者芮哲（Justin R. Ritizinger）的研究，民国佛教界留学锡兰的运动开始甚早，但中国留学僧们在锡兰的日子并不好过，主要的原因是锡兰僧界不承认中国僧人教职（ordination）的合法性，连他们穿的衣服都比锡兰僧人所穿要差，更要命的是按照南传佛教的戒律，不允许僧人握有钱财，这导致留学僧陷入经济困难，正如他们所说：“由‘留学生’一变而成‘流落僧’”。^{[15] (p149-173)}所以强调法舫的传教师地位似乎有倒逼锡兰佛教界承认中国传教师合法地位的意思，当然也是为了避免他们在锡兰的生活陷入窘境。

法舫、达居、白慧等人的出访其实非常仓促，太虚一面申请教育部批准、备案；一面让法舫等人随时准备出发。“为争取时间，法舫等于九月二十九日，乘中航机由渝飞昆明。次日（十月一日），当即函呈法座，一面函请教育部致函西南运输处，准予法舫等免费乘车至腊戍，一面向外交特派员领取护照，特派员告以至仰光再请英政府签字，十月九日，得教育部许可免费乘车。遂于十二日乘车出发；十五日抵保山县，留三日；十八日，由保山续程，二十日抵芒市，留一日。为代表大师交涉在芒市设立滇边特区佛教联合会，及佛教学校事，访问方克光土司，及恩德嘉僧长；交附林主席题匾匾额，及大师函件，方君等喜悦无量。十九日由芒市出发，二十日抵腊戍，（引者注，此二句时间似有误，二十日由芒市出发，二十一日抵腊戍，更为合理）改搭火车赴仰光，二十二日即安抵仰光矣。”^{[14] (p437)}可见，此次出行并未作充分准备，而是一边前行，一边办理各种手续，其间教育部、西南运输处和外交部都特事特办，提供了便利和协助。而且费用全部由政府负责，“每年发给补助费国币三千元以外，第一次并给路费三千元。”^{[14] (p437)}僧人出国传教留学，得到政府的津贴，这在民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法舫等人到达缅甸后，遇到阻碍，不得不滞留缅甸。据法舫等人报告，锡兰政府要求有当地资产在十万元以上的人担保才能颁发签证，法舫等一面请求锡兰佛教会马拉会长作担保，一面在缅甸补习英语。“时我戴院长访问缅甸，法舫与之晤谈数次，指示吾等宜在缅甸研究留学，彼意缅甸之佛教与锡兰，同属南方佛教，同系巴利文语；其次，缅甸与吾国土地接壤，缅甸佛教宗教上尚无良好深切之联络，似应多与缅僧接触，以先打通中缅联系，于目前环境，十分需要。”^{[14] (p437)}此处“戴院长”指的应是戴季陶，1940年10月戴季陶经仰光访问印度，故应在仰光有短暂停留。^{[10] (p452)}

而实际上，法舫的报告可能也是一种“伪装”。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解密档案《为经会商决定派遣佛教访问团赴缅甸宣传拟请核拨该团经费国币二万元并饬财政部准照法价折购外汇由》披露，“金以佛教徒为缅甸主要份子，其态度每能影响其政治之动向。爰再决定组织佛教访问团赴缅甸从事宣传。由太虚法师领导该团，访问地域及人选等项均已与太虚商洽。”可知太虚访问团的真正核心是缅甸，而其他国家则是附带访问，也即国民政府真正担心的还是滇缅公路这条抗战时期的生命线的安全，故欲借助佛教的宣传，来获得缅甸佛教徒的支持。^{[8] (p52)}法舫等人受戴季陶示意留在缅甸，恐怕其真实意图仍在拉拢缅甸佛教徒支持中国抗战。

法舫等人在缅甸的工作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来在仰光补习英文，为在锡兰和印度布教作准备，于巴利文亦有涉猎；二来

研究南方佛教，有感于中国当时“无一本写缅甸之著述”，立志弥补此领域空白；三为增进邦交；四、注意联合国际佛教徒，如印度、锡兰、泰国、不丹诸国之留缅甸人，均作友谊之联络；五、凡有机会，即宣扬中国佛教文化，及现在抗战救国情形，而争取吾国际佛教之同情焉。^[16] (p438-439)

概括而言，他们的工作又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研究南传之佛教，及印度梵文巴利文，宗教哲学等”。^[16] (p389-392) 他们越发意识到东南亚和南亚佛教重要的战略地位，“南方各佛国，如印度、缅甸、锡兰、泰国、越南、马来亚等所传佛教，皆系巴利文原始佛教，西洋人之研究佛教，亦依据巴利。吾国如与南太平洋诸国沟通文化，及宣传中国文化，非研究巴利文佛教不能得其根源，亦不能作世界佛教之宣扬与联络。观之日本，则派遣大量僧人，在各国留学，并作诋毁吾国之宣传，即可见其重要。”^[16] (p439)

二是，“为佛教，为国家宣传，联络南洋缅甸、印度、锡兰诸国佛教徒，为国家争取友人”。^[17] (p389-392) 日本在东南亚大肆宣传他们“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而佛教则是他们推销其军国主义的一个重要“幌子”，例如日本人矶部美知氏曾提出“新摩揭陀帝国论”，其主要观点是：摩揭陀国曾强大一时，虽然它已经崩亡，“而由它的势力，已筑成了千年永昌的文化。那就是佛教的时间和空间的扩充……佛教发源于印度，而残存于锡兰、缅甸、泰国、越南、爪哇、中国，最后东渐日本。今日唯缅甸、泰、越、日本，保存余荣。如果这三国——缅、泰、越，可能的话，连锡兰岛也一同加入联合，形成一联邦国家，而以泰国为‘盟主’构成据亚细亚之大陆防御线，或成为亚洲南部之一防堤。如是成功，则可计亚洲万年之安定，置和平于磐石之上。”^[18] (p52-57)

法舫等通过演讲、登报等方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指出：

敌寇在太平洋上南进，是有主动的政策，而不完全是被动的。南进是他的野心，是他既定的国策，当然他一定要南进。他的野心是实现“强寇式”的“大亚细亚主义”，扩大“主奴式”的“共荣圈”，实行“尊日式”的东亚新秩序。这就是敌寇征服亚洲真正的心肝。

“南洋是日本的生命线”，这是寇敌肺腑的哀言，也是南进的宣言。^[18] (p52-57)

对日本利用佛教来蛊惑亚洲佛教徒，法舫尤其重视揭露其阴谋本质，他指出：“他（引者注：矶部美知氏）主张现在亚洲各佛教国，应该共同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摩揭陀帝国’，而以日本‘大亚细亚主义’为中心，日本佛教为主体。质言之，他利用佛教的名义，来诱惑东亚各佛教民族，走进日本‘共荣圈’。这是很可注意的毒素糖衣糕饼，尤其在今日敌人正积极南进的时候，实在是不容忽视的一种阴谋。”“敌人聪明，他知道这南洋海滨各国的人民，都是信仰佛教的，所以他想要尽方法利用佛教。”“敌寇利用佛教的活动，在南洋是很厉害的，很积极的，传说由东西两本愿寺和日莲宗，两派共同派到印度去活动的和尚，有一百多。派在越南，听说有八十人，派在泰国的有五十人，缅甸、爪哇、马来西亚，都有不少的数目。这些日本和尚，是特殊的南进先锋队……末了，我们中国政府和人民，尤其是在南洋的华侨，更不可忽视敌人这种利用佛教的阴谋。假使敌人的新摩揭陀帝国计划成功——就是南进成功，我们的一切国际出纳口，当被敌切断，而且是我们包围了！敌人的三年半的侵略，不能战胜我们，反而使他陷入泥坑，他今日积极的南进就是想拔泥脚，实在是进攻中国最毒辣的一着。而他这一着的进行，就利用了佛教，我们应该在佛教方面，和敌人斗争！”^[18] (p52-57)

法舫等人还呼吁中缅佛教徒将佛教的救世精神与救国担当结合起来，他认为大乘佛教的利他精神就是“救世救国”的精神，建议大家朝三个方面努力：“（一）要改造当前人类的互相残杀，而换以互相救护。（二）要改造人类的自利侵略，而换以利他互惠。（三）要改造人类的各种自我主义，而换以自由平等。”具体而言，他又呼吁在缅甸的佛教同胞作如下几件事：一是宣传于国家有利的言论，二是出钱出力，把人力财力贡献国家；三是在仰光多做中缅佛教亲善工作。^[19] (p445-446) 他们将大乘佛教利他主义与救国事业联系起来也可谓“契时机”的方便说法了。

法舫等人的宣传对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争取对中国抗战的支持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在缅甸举行的大型佛诞联欢会上，“法舫法师告以希望中印缅佛教徒亲善联合挽救世界之灾危，随后谈论日本佛教及日军摧残中国人民及佛教之行为，各僧长及诸信士等皆谓：‘日本无真实佛教，真正佛教绝不残杀人类及摧灭佛寺僧众也。’”^{[20] (p422)}

此后，法舫于1942年初由缅甸步行到达印度。在印度国际大学，作极“国民外交性”之友谊推进。^{[21] (p100)}1943年3月18日法舫离开印度赴锡兰，除弘传中国大乘佛教外，并研究巴利文三藏，住锡兰东方学院。^{[22] (p282)}“法舫来锡兰之后，即随时宣传中国佛教，及中国文化，中国抗战之一般情况，三年以来，常在数百佛教徒之大集会中讲演，此间人民对中国佛教，中国一般情形始皆知。”白慧则留居印度国际大学，专门攻读印度文、梵文，及印度哲学、宗教等。1944年10月，法舫离开锡兰，返回印度。1945年7月起，法舫在锡兰摩诃菩提会创办的传教师训练所讲授中国大乘佛教，为将来佛教谋发展。^[17]11月，法舫、白慧等参加印度东方学会年会。^{[23] (p234)}

抗战胜利后，法舫、白慧曾经向国内汇报这段经营海外的经历，说：“在过去即大战之前，此东南各国民族，皆亲日本，希望日本有以助彼等独立。大战发生后，彼等则盼日本战胜，彼等可以获得独立。日本占领，虽统治更有恶于英国者，然彼等对日人之希望仍强。战争结束时，此间人民皆曰：‘唯一东方强国，今日休矣！东方各国将永远被白人统治也。’言之颇觉悲痛！而今日唯一之希望，彼等即凭吾中华民国。如最近印度国大领袖之表示，锡兰国会议长沈那先生之演讲，缅甸过去反华亲日首相宇素之发表演说，皆寄无限希望于中国。是故今后十年或二十年内，吾国各界，应努力和平建国。对此东南亚各民族文化之认同与研究，更必须勇往前进，追上欧人。吾国在亚洲作领袖国，首先必须互相研究，互相认识，使彼等恢复对中国文化文明之信仰，盖吾国民对此方面向为忽略轻视，不加重视，盼今日在文化方面，先做最大最广之研究与联系也。”^[17]这可谓道出了东南亚诸国在抗战胜利前后的不同心态。一方面说明了太虚及法舫、白慧等在抗战期间积极进行“佛教外交”的必要和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提示了抗战胜利，中国佛教，甚至中国政府在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发展机遇，这意味着武昌佛学院一系在该地区的佛教交流活动有了新的目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抗战胜利后太虚僧团在东南亚的佛教交流活动

由上可见，法舫、白慧等人认为印度、锡兰、缅甸等国领袖在抗战胜利后都“寄无限希望于中国”，我国要想作亚洲的领袖国，有必要加强对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的民族文化之认同与研究。所以法舫等人恳请太虚大师准予留印度对该地区的佛教及文化作进一步的研究。1946年8月《海潮音》的佛教新闻说道：“法舫法师前由印度转锡兰，瞬届三年，其宣传于联络工作颇著成绩，所研究巴利文亦甚有心得，现又开始研究梵文。近应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谭云山院长之约，仍将返印度，除研究梵巴文外，并留心于印度佛教史及其宗教思想之探讨。闻已恳请太虚大师准予留印度作更深之探究云。”^{[24] (p39)}直到1947年太虚法师过世，法舫法师才不得不从印度赶回国内。1947年11月1日，法舫在比拉花园，见到甘地，约谈十五分钟，所谈乃印度和平与中印合作问题；于11月24日由加尔各答乘船赴新加坡。^{[25] (p126)}一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地作演讲，备受欢迎，当地信众一再挽留，最后在国内师兄弟的催促下，于1948年5月乘船到达上海，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

这一时期，法舫等人在东南亚和南亚的活动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

一是除了对梵文、巴利文、英文等语言的学习外，从事巴利文系佛教的研究，特别是对阿含经和戒律的研究。他说：“阿含及律，为释尊亲说，对于印度古时宗教、哲学、社会风俗，都有评述。于人生现实生活有切肤之指示，苦口婆心，四十九年，为救度苦海人类，所说过此耳！国人自古有‘贬小扬大’之明，遂使佛教入于‘玄门’，远离人间，此后若能提倡研究阿含，从寺僧及信徒的本身生活上去应用佛法，千万莫再入‘五玄十妙’之门，以及‘清谈’、‘极乐’之迷。”（《南海读〈海潮音〉杂感》）^{[18] (p340)}

二是宣传人间佛教理念。法舫于1947年佛诞日在星洲（新加坡）菩提学院欢迎会演讲，题目为《从唯心净土说到人间净土》，其主张：“世界佛教徒联合起来去宣扬佛教真正和平慈爱的道理，以感化世界。使他们在政治上要互相礼让而放弃我见，在经

济上要布施博爱而放弃侵夺。如果，我们每一佛徒能与另一佛徒合作，努力宣扬佛化，先从一家一村做起，使一家一村能行五戒十善，能行四摄六度，则一家成为清净家庭，一村成为清净乡村，由此再推及国家、世界，则婆婆苦世便成极乐净土。”^{[26] (p165-166)} 1948 年，他又发表《大同思想与大乘佛教》，认为“创教的释迦牟尼，原是一位反对当时印度社会现状而倡行革命的人。因为他的学理高深，行为大众化，平民化，处处都是为了人类全体利益的着想。”^{[26] (p196)} 提倡释迦牟尼“大众化、平民化”的作风似乎是有意将南传佛教注重实践，注重人生改造的思想与太虚法师所提倡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否定鬼神的佛教思想会通起来。法舫在马来西亚菩提学校讲《佛学宗要》，他的核心观点是：“小乘佛学的原始时代，宗教意识的成分非常之少，几乎没有。法师继而分析释迦牟尼的佛教发源的态度，谓实际上，当时释迦牟尼的目的是求借此以改造人生，因此，佛教是与每一时代的人民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在现时代，任何人如能舍弃自我，即是自我牺牲而为人人类大众服务，救苦济难，那么，这种人便是菩萨。其实，菩萨本身并不是不可思议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综合称之为‘四摄’，即布施（牺牲）爱语（宣传）同事（同做事）利行（以大众利益为前提）这便是大乘。”^{[27] (p265)} 这试图强调大小乘佛学的共同目标是：改造人生。实质上可谓在人间佛教的理念下融会大小二乘、汉传与南传两种佛教。法舫在太虚法师之后，继续在东南亚提倡人间佛教，对东南亚佛教，尤其是马来西亚佛教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人间佛教思想仍然是马来西亚佛教发展的主要主导思想之一，太虚、法舫等人功不可没。^[10]

三是在中印文化的大框架下沟通东南亚文化。1948 年法舫在星洲僧伽策进社欢迎会讲《中印文化与东南亚之关系》，指出东南亚文化的本质是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交融的产物，“东南亚是中印文化聚会的区域。”“这两个文化，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没有互相斗争。在经济上也没有互相争夺市场，总是和平相处。……这就说明了中印两大文化是和平的文化，而不是霸道的文化。中印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文化的精神，以‘信义和平，忠恕礼让’为根本……印度文化的精神，以‘慈悲、布施、无我’为主，既有慈悲，绝不会有残忍的争斗，既行布施，当然没有霸占侵略的行动。在侵略思想盛行的今日，中印侨民在这东南亚的各地，从未有发生过任何争端。这就是象征着中印两国文化的和平精神。”^{[28] (p155-156)} 这是以热爱“和平”来总结中印与东南亚文化，这不仅在理论上站得住脚，而且也容易在已饱受战争之苦的各国民众中产生共鸣。法舫认为中印这种和平的文化正好能补救西方文化的穷途末路，他主张：“由中印两大国家联合东南亚各国，共同作世界和平运动，一定能达到永久的世界和平。”^{[25] (p156)} 法舫的这种思想可以说是太虚大师“世界佛教运动”的题中之义，只是有了更加丰富具体、切合实际的内容。

当然，法舫等人在国外出访、留学的实际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他们几乎由“留学生”变为“流落僧”，他们不受锡兰本地僧众的尊重，甚至这种低下的身份表现在他们的僧服也比本地僧人的要更差一些。由于经济困难，他们不得不在当地的小学与小學生一起学习英文，甚至太穷了，以致连回国的路费也没有，全然没有退路。在国内是受人敬仰的高僧，在国外却沦为“流落僧”，这种心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法舫于 1951 年便早早过世，其他留学僧回国后基本都还了俗。^[15] 所以在太虚僧团在东南亚、南亚地区为抗战，为沟通中国与该地区各国友谊，为融通中国佛教与该地佛教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光辉之下，是他们坚韧弘毅地经受着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窘迫。

三、结论

从 1939 年底太虚领导的佛教国际访问团出访南洋诸国，到法舫 1948 年初回到国内。武昌佛学院一系的太虚及法舫、白慧、达居等师徒两代人在东南亚和南亚诸国开展了多年的“佛教外交”活动。他们的任务包括两大方面：“一者，为佛教，为国家宣传，联络南洋缅甸、印度、锡兰诸国佛教徒，为国家争取友人。二者，研究南传之佛教，及印度梵文巴利文，宗教哲学等。”^[17] 在抗日战争期间，主要任务偏向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和阴谋，团结该地区的佛教徒，联合抗日，保障国际援助能从滇缅公路进入中国；而在抗战胜利以后，主要任务更多地偏向于研究南传佛教、印度梵文佛教及南亚、东南亚的宗教和哲学等，试图以“人间佛教”理念沟通大小二乘佛学、汉传和南传、印度佛学，这构成了太虚“世界佛学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这两个任务是贯穿始终的，只是不同时期策略有所偏重。

太虚、法舫等人对东南亚地区的交流实践和研究成果对当今开展“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历史经验。我们认为至少包含如

下三方面的启发：

其一，应该重视佛教在联络东南亚和南亚各国之中的重要战略作用。东南亚和南亚诸国的佛教徒数量庞大，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影响力巨大，在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等国佛教甚至是国教，因此，佛教可以成为加强中国与该地区各国、各民族友谊的一条重要“桥梁”和“纽带”。而且研究南传巴利文系佛教和印度梵文佛教，加强与汉传佛教的交流，有利于二者相互补充，例如南传佛教重视戒律的地位、修行体系严密，这些都可补汉传佛教之不足，而汉传大乘自利利他的菩萨道精神也可丰富南传佛教。

其二，人间佛教思想与南传佛教有着会通之处。人间佛教与南传佛教都注重人生的改造，注重实践，反对佛教的鬼神化趋向，正如法舫所说：“佛教是与每一时代的人民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在现时代，任何人如能舍弃自我，即是自我牺牲而为人类大众服务，救苦济难，那么，这种人便是菩萨。”这可谓为会通大小二乘佛学提供了思路。当代东南亚人间佛教思潮也是主要的主导形态之一，因此，以人间佛教思想的理念会通南传佛教也有其一定的现实基础和经验。

其三，和平主义是中印与东南亚文化的核心特质。正如法舫所指出，倡导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的交流合作，核心是发挥这些地区传统的热爱和平的文化精神，在友好和平、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展开经济、贸易、政治、外交、文化等多方面的合作。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大多属于信仰佛教的国家，佛教慈悲、平等、无我、自利利他等伦理思想为丝路商贸的畅通提供了文化保障；当今无疑也可以继续发挥这一地区爱好和平的传统文化，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展开，尤其是“民心相通”营造良好的外交关系。

参考文献：

- [1]太虚. 太虚法师在伦敦无线电中告全球的佛学同志[A]. 黄夏年. 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1卷）[C].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
- [2]太虚. 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A]. 太虚大师全书（第31册）[C].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 [3]李仲良，杨铭. 抗战时期的中国国际佛教访问团研究[J]. 中华文化论坛，2016, (10).
- [4]印照. 太虚与近代中印交流[J]. 世界宗教研究，2018, (5).
- [5]曾友和. “中国佛教访问团”走出国门宣传抗日[J]. 四川档案，2012, (4).
- [6]明成满. 民国僧侣在东南亚的抗日宣传研究：以“佛教访问团”和“步行宣传队”为中心[J]. 南洋问题研究，2014, (2).
- [7]侯坤宏. 太虚时代：多为视角下的民国佛教（1912-1949）[M]. 台北：政治大学出版社，2018.
- [8]纪赞. 旧材料、新视角：新加坡本土报章中的太虚[A]. 王颂. 北大佛学[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12).
- [9]太虚. 中国佛教的近况（二十九年一月在加尔各打华侨欢迎会讲）[A]. 太虚大师全书（第27册）[C].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 [10]陈秋平. 人间佛教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与发展：以太虚大师及其学生在马来（西）亚的活动为研究脉络[J]. 世界宗教研究，2009, (3).

-
- [11]太虚. 访问团通电[A]. 太虚大师全集（第 26 册）.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 [12]赖岳山. 抗战时期“太虚-佛教访问团”事件考论[A]. 佛教与现代中国：青年学者工作坊会议论文集[C]. 杭州：浙江大学，2019.
- [13]石云. 送法舫法师出国[A]. 黄夏年. 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 200 卷）[C].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
- [14]陶冶公. 送法舫上人锡兰宏法[A]. 黄夏年. 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 200 卷）[C].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
- [15]Justin R. Ritizinger, “Original Buddhism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Chinese Buddhist Exchange Monks and the Search for the Pure Dharma in Ceylon” [J]. Journal o Chinese Religion, 44:2.
- [16]法舫. 法舫法师等在仰光之报告[A]. 黄夏年. 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 200 卷）[C].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
- [17]法舫, 白慧. 世界佛学苑海外报告[A]. 黄夏年. 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 202 卷）[C].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
- [18]法舫. 日寇南进对佛教国之阴谋[A]. 梁建楼. 法舫大师文集（第 5 卷）[C]. 高雄：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
- [19]法舫. 佛教救世与救国：法舫法师在佛学会八周年纪念会讲演[A]. 黄夏年. 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 200 卷）[C].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
- [20]法舫法师参加缅甸佛诞联欢[A]. 黄夏年. 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 200 卷）[C].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
- [21]海潮音（第 23 卷）（10）[A]. 黄夏年. 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 201 卷）[C].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
- [22]海潮音（第 24 卷）（8）[A]. 黄夏年. 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 201 卷）[C].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
- [23]海潮音（第 26 卷）（11）[A]. 黄夏年. 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 202 卷）[C].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
- [24]海潮音（第 27 卷）（8）[A]. 黄夏年. 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 203 卷）[C].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
- [25]海潮音（第 29 卷）（1）[A]. 黄夏年. 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 204 卷）[C].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
- [26]梁建楼. 法舫大师文集（第 3 卷）[M]. 高雄：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
- [27]海潮音（第 29 卷）（6）[A]. 黄夏年. 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 204 卷）[C].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